

WENXUE YINYU YANJIU

文学隐喻研究

朱全国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ENXUE YINYU YANJIU

文学隐喻研究

朱全国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隐喻研究/朱全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04-9927-5

I. ①文… II. ①朱… III. ①隐喻-研究 IV. ①I0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45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丁国旗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赵宪章

朱全国君 2005 年秋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很快就进入角色，决定将“文学隐喻”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其实，此前他在这一领域并没有多少研究，他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时髦的论题，诸如当时被热炒的“文学意识形态”之类，说不定也能混得博士学位，那就比较轻松。可是他没有寻求这样的捷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隐喻”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理论之一。他的学术兴趣在文学本体研究。但是，包括隐喻在内的文学本体理论，相对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一直没有引起我国文学理论界的充分关注，于是，可供直接拿来参照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从而增加了这一研究的难度。他执意选择这一高地攻坚，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几个假期都在图书馆里度过。我很赞赏他的这种学术勇气，赞赏他对于文学和学术的执著与真诚。

恰如许多学者所意识到的那样，“理论脱离现实”是我国文艺学长期以来的痼疾。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所面对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文学理论究竟要联系什么样的“现实”等，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是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生态恶化之类，我们的文学理论应当批判

这些东西，就像当年的别、车、杜，或者仍然游走在学界和政坛之间的乔姆斯基那样。这种直接向社会喊话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也是每一个胸怀良知的社会公民的责任，但却不是文学的，当然也不是文学理论的本分，文学理论所关注的现实首先应当是“文学现实”。于是，另外就有人认为文学理论所面对的现实应是文学界的新现象，诸如新媒体文学、大众文化，以及所谓“下半身写作”之类，对此应当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文艺理论当然可以关注这类文学现实，但是，恐怕也不能算是文学理论的本分；否则，文艺学就和当代评论无异了，文学理论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就要打个问号。总之，尽管我们意识到文学理论研究应当面对现实，但是，我们试图去面对的这个“现实”是什么，恐怕仍然不甚了然；“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堂·吉珂德所搏斗的风车不应该是他的对象。

汪正龙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他长期从事文学概论的教学，深知我们的文学基础理论存在许多“空当”需要填补、修正或完善，但是，我们的理论界却不把研究兴趣放在这里，他为此甚为遗憾。他所说的是文学教育的现实。对此，我很有同感，同样深感我的文学理论研究远离文学教育的现实。事实上，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远离文学教育的现实，而且远离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现实。恰如前几年鼓噪一时的文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我们的作家关心这一问题吗？我们的读者关心这一问题吗？我们的学生关心这一问题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文学参与者的主流群体都不关心这一问题，那么，我们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引经据典、面红耳赤地争论这一问题的意义何在？解释只有一种：争论的背后另有他图，并非文学本身。文学理论如果不关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食利者的理论，或者是向食利者乞怜、讨好的理论，依旧是在“文学工具论”的漩涡里打转转。事实是，作家们最关心

的是如何写出好作品以赢得更多的读者；读者们最关心的是如何读到好作品以不枉费阅读时光；文学的学子们最关心的则是学到独立解读文学的真知……这就是我们所呼唤的文学本体、文学本身的研究。而所谓“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果不是学者们“主动应招”或学生们“被动应考”，他们绝不可能理会，不会对这一问题产生多少兴趣。但是，在“文以载道”文学观的禁锢下，我们长期以来较少关注文学本身，把聪明才智过多地用于“道和文学的关系”甚或“道本身”的阐释上去了，以至于造成文学理论并不理会文学本身这样的怪事。这才是我们的文学理论所要面对的真正的文学现实，是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本分。就此而言，包括全国君的隐喻研究在内的文学本体理论，绝非“意识形态”之类的“屠龙术”，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换言之，文学理论之谓文学的理论，只有是文学的，才是现实的；只有是现实的，才有学术的力度。那些八竿子打不到文学的东西，不过是学术殿堂里的花瓶，招引眼球而不实用。全国君的隐喻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他的付出是值得的，哪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仅仅向前推进小小的一步。

我们之所以将“隐喻”看作文学的根本，是因为我们至今尚不能否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经典论断；而“隐喻”之最初和最根本的来源与指向，就是语言的修辞术。所谓“修辞”，就是把话说得更好、更动听、更有诱惑力，就是使语言成为艺术，或者说是语言的艺术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隐喻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隐喻理论成为文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他的《修辞学》就和他的《诗学》密切相关。他在《诗学》中提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思想，就和他的修辞理论密切相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一个非常朴实的文学真理，尽管后学们提出过难以计数的文学定义，包括道家们

以各种口实将文学意识形态化，都无法彻底颠覆这一通俗的真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之所以难以颠覆，就在于它是建基在“媒介分析”的基石之上。在他看来，由于艺术所使用的“媒介”不同，艺术也就有了差别。例如绘画的媒介是颜色、音乐的媒介是声音，文学的媒介就是语言，所以诗是语言的艺术。毫无疑问，以“媒介”为参照划分不同的艺术种类，从而将文学定义为“语言的艺术”，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论断；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定义文学，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唯心主义。而那些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们，在极力将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不知是否考虑到这一点？

隐喻的最初和最根本的意指来自语言学，并不是说它仅仅属于语言学。特别是20世纪之后，隐喻实际上成了文艺理论、形式美学、符号学、人类学、神话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所共享的基本概念。全国君的隐喻研究就是试图吸纳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其融会在文学基本理论的层面展开自己的言说。这种意义上的“跨学科”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没有牵强、不露斧痕，在《文学隐喻研究》的逻辑框架里浑然不为人知，显示出作者具备很好的学术驾驭能力。这和那些打着“跨学科”的旗号去争项目、争奖项的做派完全不同，也不是为了迎合“跨学科”的导向而故意为之，不是为“跨”而“跨”。

4 由于“隐喻”已经演绎为许多学科所共享的概念，我们将其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重新审视，就需要把握好它的言说边界；否则，就成了无所不包的“隐喻概论”。全国君做到了这一点。他首先梳理了隐喻研究的历史，由此发现：隐喻研究对于文学而言主要涉及三方面，即作为认识论层面的思维方式、作为语言艺术的话语方式、作为文学理解的意义呈现。在他看来，“同一性”和“相似性”是隐喻的基本思维方式，二者都以经验为基础；“符号偏离”与“概念隐喻”是文学隐喻的一般特

征，它的运作方式是“类比映射”和“双重想象”。他还结合具体文体阐发了文学隐喻中的意象、象征和语境等问题。这样，他实际上是从文学语言出发，以“文学性”为中心展开自己的逻辑表述，在涉及文学隐喻的几个重要方面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多有新意，富有启发性。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理论问题的研究，都有多种路数可供选择或置换。文学隐喻研究也是这样：没有唯一，只有很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这一问题上，全国君不妨借鉴解构主义的理念，在今后的研究中，选择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论述方式，为我们不断展现“隐喻”新的地平线，使这一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始终保持应有的张力。我相信，关于这一问题研究，有着很好的生长性和不息的生命活力。

我们期待着。

2011年3月16日

于东海大学邦华会馆

目 录

序	赵宪章(1)
引论	(1)
第一章 同一性与相似性	(49)
第一节 隐喻与同一性	(49)
第二节 隐喻与相似性	(68)
第二章 符号偏离与概念建构	(109)
第一节 隐喻与符号的偏离	(109)
第二节 隐喻与概念的建构	(129)
第三章 双重想象与陌生化	(151)
第一节 隐喻与双重想象	(151)
第二节 隐喻与陌生化	(196)
第四章 意象、象征、神话	(228)
第一节 隐喻与意象	(229)

第二节 隐喻与象征	(239)
第三节 隐喻与神话	(249)
第五章 语境与意义	(264)
第一节 隐喻与语境	(264)
第二节 隐喻与意义	(286)
主要参考文献	(307)

引 论

一 历史、现状与区别

（一）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隐喻研究在西方历史悠久，从古希腊至当代，绵绵不绝。对于隐喻研究的历史分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束定芳在《隐喻学研究》一书中根据隐喻的研究范围和方法，把西方的隐喻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从古希腊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修辞学研究；20 世纪 30—70 年代的语义学研究；20 世纪到现在的隐喻多学科研究^①。这种分类方法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注重了隐喻研究的重心所在，特别注意了隐喻与语言学的关系。张沛的《隐喻的生命》则从隐喻学科的发展实践出发，把隐喻的研究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古希腊至罗马时期；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16—19 世纪；20 世纪上半叶；20 世纪下半叶。张沛对隐喻研究的分类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坚持了隐喻研究的实践，二是把隐喻研究的历史，特别是 20 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历史置于修辞学的大背景之中。国外的学者对

^①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于隐喻分期也有所探讨，他们一般注重理论本身。如布莱克在《模型与隐喻》(*Models and Metaphors*)中就是依据隐喻理论本身讨论了其先前存在的亚里士多德的比较理论与昆体良的替代理论。霍克斯的《隐喻》可能是西方隐喻理论研究中对手喻分期较为仔细的，不过从其书中的内容来讲，与其说是对隐喻的分期，倒不如说是对隐喻史的一个简写，他所重视的是史的一面，并没有对分期做出特别的规范和要求。最近出现的对隐喻的分期在利真伯格(Michiel Leezenberg)的《隐喻的语境》(*Contexts of Metaphor*)之中，他把隐喻主要分为隐喻的前历史时期、亚里士多德时期、维柯时期及20世纪这样四个时期。

结合以前中外学者对于隐喻研究的分期，有两个标准必须坚持：实践性、代表性。实践性主要是指在分期的过程中注重隐喻本身研究的实际情况；代表性则是注意这些观点是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是否代表了具体时代的最高研究成就。从这样的标准出发，本文认为隐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希腊、古罗马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是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这个时期是隐喻研究的肇始期；第二个阶段是中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维柯、卡西尔、瑞恰兹、布莱克，雅格布逊，这个时期是隐喻的重新发现并逐步走向多元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六七十年代到现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塞尔、戴维森、霍克斯、保罗·利科、莱克夫和约翰逊、杰拉德·斯汀、埃科，等等，这是隐喻研究的深入期。

1. 隐喻研究的肇始期

这个时期隐喻研究的许多方面成为后来人研究的基础，规定了后人对隐喻研究的方向。古典时期第一个值得人们注意的事是柏拉图对修辞的戒心。他在《斐德罗篇》和《国家篇》中对使用隐喻和其他修辞手法的诗人进行了讽刺和批判，甚至把诗人称为“坏人”。于是柏

拉图被认为是反对隐喻的鼻祖，但是其反对并不是在诗学的范围之内，而是反对隐喻的政治和伦理修辞的意图，他并未对隐喻本身进行研究。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修辞学》中开隐喻研究的先河，对一系列的隐喻问题，如隐喻的定义、功能、分类、在使用隐喻时应注意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体现出隐喻是修辞学与诗学共有的特点。此后的一些研究大多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些理论出发对隐喻做进一步的探讨，他对隐喻本身的认识及其分类直接成为后人研究隐喻的典范和出发点，特别是其隐喻的修辞——诗学一体的观点，奠定了后世隐喻诗学研究的基本风貌。

古罗马时期的隐喻研究是古希腊时代的继续。《赫瑞尼斯修辞学》对隐喻有所论述，“在关于隐喻的问题上，这本书强调‘合式’，也许这就是它的特点所在。”^① 作者介绍了六种隐喻及45种辞令藻饰。《赫瑞尼斯修辞学》很显然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对隐喻分类的思想，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对昆体良的隐喻分类有所启示。昆体良的隐喻理论，特别是其关于隐喻与语言的理论是古典隐喻理论中的代表，“也许可以说，它代表着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类分析的最高水平”。^② 在《演说术原理》中他指出，隐喻语言是在常规语言基础上升华了的诗性语言。昆体良也对隐喻进行了分类，整体看来，昆体良的隐喻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昆体良对于隐喻修辞功能的强调，它们一起构成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隐喻的最主要的内容。在昆体良和《赫瑞尼斯修辞学》那里，隐喻和明喻分别成为一个辞格，隐喻被大大地缩小。隐喻也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修辞——诗学一体的状况发展成为一种修辞格。

① [英] 霍克斯：《隐喻》，穆南译，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4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2. 隐喻研究的重新发现与多元化时期

中世纪在隐喻的问题上受神学的影响，隐喻本身的研究陷于沉寂。中世纪的隐喻一方面体现在对亚里士多德和昆体良隐喻分类的继承，特别是后者；另一方面来自于对隐喻意义理解的继承，隐喻在这个时期更多的是传达神的旨意的工具。这一时期的隐喻研究主要体现在温沙夫的《新诗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及但丁的《致斯拉加大亲王书》之中。《神学大全》继承了中世纪利用隐喻来阐释《圣经》的传统，其中提出的隐喻经解四义说成为但丁隐喻理论的先导。《致斯拉加大亲王书》的隐喻观点是继承阿奎那的隐喻观点形成的。但丁把作品的意义分为字面义、比喻义、道德义和寓言义，不仅运用隐喻观点解释上帝的意旨，而且用来解释《神曲》的主题、主角、目的及世俗的文学艺术，因此但丁的隐喻观点具有更加广泛的文艺学内容，这样就使沉寂于神学的隐喻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艺术的空间之中找到了本来属于它的位置，恢复了古罗马时代所忽视的诗学特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隐喻得到了重新发现。

17—18 世纪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维柯研究了隐喻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问题。认为人类生而具有的“诗性智慧”就是一种隐喻思维。19—20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和 20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斯特劳斯《野性思维》中所描述的情况就是“诗性智慧”的表现。19—20 世纪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对隐喻的认识可以看作是维柯隐喻式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卡西尔认为，“部分替代整体”是最初语言和神话共有的基本原则。他认为所有的神话都遵循这条原则，同时这也是隐喻的一种主要的类型。因此，人们不仅从卡西尔对语言、神话和隐喻三者关系之中看到维柯对隐喻认识的影子，同时也可以看到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对于相似性的起源以及人们为何在修辞上采用隐喻的人类学的答案，它

们最显著的特点是把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来看待。

“传统的隐喻理论不具预测力，它们只能解释已经发生了的现象。”^① 这种情况到了新修辞学，即瑞恰兹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和布莱克的《模型和隐喻》（*Models and Metaphors*）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瑞恰兹和布莱克认为隐喻是语词意义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词间的相互替代，他们把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来对待，提出了本体、喻体和喻底，“焦点”和“框架”等概念，从此隐喻研究由语词层面进入语义和句子层面。

雅格布逊的《隐喻和转喻的两极》从其诗学语言观出发，把隐喻和转喻当作是诗学分析和语言运作的两种基本模式。他指出，隐喻和转喻与不同的语言风格、文学流派相对应。隐喻与诗歌密不可分，转喻与叙事性作品相随，进而由结构学的视角出发，认为隐喻与转喻的二元模式存在于所有的艺术之中。雅格布逊把隐喻和转喻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中的“转移”、“凝缩”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两种模式：组合—移位—转喻；替代—压缩—隐喻。这一点被列维-斯特劳斯用来分析神话与原始思维，后来被拉康所继承。另外相似性与毗连性也与弗雷泽《金枝》中所体现出来的“同体感应”巫术及“模仿”巫术联系起来了。如此一来，从雅格布逊、列维-斯特劳斯到拉康就形成了一个对隐喻与转喻研究的继承。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为人们从符号的角度关注隐喻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罗兰·巴特分析了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变迁与隐喻形成的关系，埃柯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则从符号学的角度对隐喻的构成、逻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这一时期，隐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修辞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学

①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艺术与其他符号艺术的一个问题，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哲学都具有紧密的联系，隐喻研究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态势。

3. 隐喻研究的深入期

这个时期除了对隐喻的分类、对隐喻经典理论的回顾及重新阐释外，隐喻的研究渗透到各个学科的深处。如信息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影视艺术、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等，都可以找到对隐喻的研究。因此要描述隐喻的完整现状是不可能的。这里只就与文学有关的隐喻理论现状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其主要体现在对隐喻意义、认知机制、作品理解、隐喻结构、隐喻与修辞、隐喻与语言关系认识等方面。对隐喻的研究相对于以前来说，显得更加深入和广泛。

在隐喻意义研究上，塞尔在《表达和意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一文中关注了隐喻意义，在考察了隐喻与间接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后，他认为隐喻并不存在超越于字面意义之上的隐喻意义，认为隐喻研究的主要问题应该在于说话者的意义如何被听话者所理解与接受。霍尔则对塞尔关于隐喻意义的理解提出质疑，因为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接受一个隐喻时并不分析构成隐喻语词的字面意义。他认为要理解隐喻就必须找到说话者的意图。戴维森与塞尔所持观点基本一致，在《隐喻的含义》(*what Metaphors Mean*)一文中认为传统隐喻意义的理解并没有使隐喻与那些普通的言语行为区别开来，隐喻并不具有超出其字面意义的意义，也不能给人带来惊奇的效果，对隐喻的理解是建立在使用而不是意义上。另外，比尔兹利的《隐喻的意义》(*Metaphorical Sense*)和《隐喻的手法》(*The Metaphorical Twist*)对隐喻的意义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隐喻的意义源于语词逻辑的错置。

隐喻作为认知思维是近一时期研究的重点与热点，莱克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是这一思想的系统化。他们指出概念本身就是隐喻性的。通过隐喻，新的概念得以建构。雷迪的《管道隐喻》(*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和哈特曼的《认知隐喻》(*Cognitive Metaphor*)则力图对隐喻的认知机制作出解释。

保罗·德曼的《解构之图》清楚地表明了解构主义者把隐喻作为哲学修辞的方面，隐喻成为解构的有力武器。这一点在德里达和后期拉康的符号学思想中也体现得很明显。保罗·利科的《活的隐喻》及《隐喻和阐释学的主要问题》(*Metaphor and the Main Problem of Hermeneutics*)则是理解隐喻与阐释之间关系的代表，他给人们展示了修辞学与哲学之间联姻的状况，同时对隐喻研究历史上的修辞学、语义学、哲学与隐喻的关系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对隐喻结构进行分析也成为人们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以德锐·金特勒(*Metaphor as Structure Mapping: The Relational Shift*)和杰拉德·斯汀(*Structure Mapping in the Comparison Process*)为代表的——大批研究者对隐喻的内部结构，以及隐喻内部结构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细致的工作。

对文学中的隐喻进行分析也是这一时期关注的一个问题。霍克斯的《隐喻》一书回顾了从亚里士多德自20世纪以来的有关隐喻问题的简单历程，特别是他把隐喻分为古典派和浪漫派，对很多隐喻研究者都产生了影响。杰拉德·斯汀的《理解文学中的隐喻》(*Understanding Metaphor in Literature: An Empirical Approach*)对文学隐喻与非文学隐喻、作为话语的隐喻以及隐喻与读者、文本、接受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论述。勾特利在《隐喻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Metaphor*)中分析